

自觉增强程序意识

郭顺才

程序是为进行某项活动所规定的先后次序，体现为一定的规矩。俗话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领导干部自觉增强程序意识，按照程序办事，才能不断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小落实。

习近平同志告诫全党，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对于强化程序意识的重要性，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比较清楚，但仍有人不愿按程序办事，总爱绕过程序拍胸脯定调、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许诺，一旦遇到矛盾就拿权力压人。究其原因：一是迷信人情关系。觉得大家平时都很熟悉，没必要走程序，遇事习惯于打招呼。二是浮躁心理影响。平时静不下来学习有关制度和程序，遇事坐不下来分析事情始末缘由，处理问题时总是怕麻烦、图省事，视程序而不见，置程序于不顾。三是私心杂念作怪。选择性看待程序，对自己有利的就要求严格按照程序办，对自己不利的就想绕过程序走捷径。

程序的作用在于有效制约权力行

使的随意性。在各项工作中守程序，既有利于工作开展，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按照程序办事，还能让人信服，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践证明，领导干部自觉增强程序意识，可以使权力运行得更加规范有序，让工作开展得更加阳光透明，从而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这对领导干部自己也是一种保护。

当前，我们党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领导干部增强程序意识，严格按程序办事。领导干部增强程序意识，既是干事创业必备的基本素养，也是政治上清醒和成熟的重要体现。要自觉遵守程序，切实维护程序的严肃性，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履行程序不含糊，不能违背程序要求，破坏程序公正。尤其是在涉及民生福祉的问题上，必须强化程序意识，决策前多沟通，实施前多征询，该走的程序一步也不能落下，决不能随心所欲、置程序于不顾，更不能瞒天过海，把程序当“稻草人”。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尽可能面向社会公开职能、公开决策、公开程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程序公正。

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人都有“麦克风”，领导干部生活在社会公众的聚光灯下，任何一项不遵守程序的工作都可能被曝光，甚至被炒作。因此，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尤其不能觉得一些事情是小事而违反程序。小事之中有立场、有规矩、有风格，细节里面有政治、有形象、有人格。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切实管好家属和身边人员，凡事只要有规定的程序就要带头遵守，做到坚持程序一步不缺、履行程序一步不错，坚决纠正一切不

符合程序的行为，让执行程序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习惯。

能否严格按程序办事，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和工作作风。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善于加强程序意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遵守程序、按程序办事，有问题依靠法律法规、按照相关程序解决，坚决纠正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程序意识重要性的同时，也要看到程序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防止其成为某些官僚主义者消极怠政、为官不为、推脱责任、不敢担当的挡箭牌，但这并不影响对违反程序行为的惩处。

(原载《人民日报》)

理论前沿

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和总体目标

赵进才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根据长期管党治党的经验，结合新时期的特征而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心和政治智慧。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既有历史逻辑，也有深刻内涵，并且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从严治党。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提出，只有党和军队“加强纪律性”，才能实现“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深刻分析新时代我们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到“全面从严治党”；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从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要议题，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新部署，开创了从严治党的新局面；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可以看出，我们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透彻。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其中，“全面”就是管党治党要面向8900多万党员、450多个党组织，并覆盖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严”就是真管

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各级党委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合力抓好党的建设。

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实现自我净化，必须坚持贯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

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树立清晰目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通过长期各项工作的开展，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②12

(作者单位：中共周口市委党校)

思想观澜

宪法修正案与“辨上下，定民志”

祁永亮

3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合党心顺民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正如《易经·履卦》象辞所说：“上天下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卦的上卦为天，寓意为统治阶级；下卦为泽，寓意为被统治阶级。人们看到苍天在上草泽在下，自然和谐，由此认识到，社会管理也应像自然界那样，分清上下，明确秩序，民心才能安定。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制定于1954年9月，后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分别于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三部宪法，并五次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修改、完善，明确了各阶级、各团体、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稳定了民心，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一、新中国需要宪法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束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等伟大斗争的胜利，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过渡时期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相互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既是大家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国家政权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但对于何时用普选方法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时至1952年，第一届政协已经运行三年，是继续由人民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还是通

过选举，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这是很紧迫的问题。

1952年，中共中央经过酝酿研究，决定向全国政协常委和民主人士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征求意见。1953年，成立了以毛泽东等32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等23人为委员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12月27日，毛泽东将中央日常事务委托给刘少奇处理，带人来到杭州西湖，专心起草宪法。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并对外公布了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征求意见。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作最后审议。毛泽东在表决前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千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

二、新宪法安定民心

1954年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1197名代表，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性质，也就是在一个国家之内，谁是统治阶级？谁是统治阶级的同盟军？各阶级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统治的政权形式是什么？等等。总之，宪法所要解决的正是“辨上下，定民志”的问题。

“辨上下”，要明确的谁在上是统治阶级。宪法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广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要明确谁在下是被统治阶级，怎样对待被统治阶级。宪法第十九条给出的答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同时结合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对各民主党派在国家中所处的位

置，宪法在序言中表述为：“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辨上下”，还要明确一国之内各民族之间怎样相处。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三、新时代修正宪法

时光荏苒，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但好宪法必须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新一轮宪法修改始于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宪法修改工作。11月13日，中央发出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共征集各方面提交的书面修改建议报告118份、修改意见2639条。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2018年1月2日至3日，张德江受党中央委托，主持召开4场座谈会，分别

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委（党组）负责同志、智库和专家学者、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负责同志对中央修改宪法草案的意见和建议。1月18日至19日，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月29日至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讨论了中央修改宪法、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工作的决策部署，决定将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这次宪法修正，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充实完善了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爱国统一战线在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基础上，增加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等。

宪法修正案顺应时代新特点、发展新要求，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将进一步凝聚起中华民族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的磅礴力量，成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②12

(作者单位：周口市委党校)

调查研究

新媒体内容供给中的困境

王锦春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让人看到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神奇，随之而来的“技术决定论”之观念日渐兴起，这其实是媒体融合中的一个误区。的确，只要投钱就能建“中央厨房”，建融媒体中心，建“两微一端”。这些当然是必需的。但是，这些“高大上”的平台发布什么？这些五花八门的渠道传播什么？归根到底，还是内容。新媒体如果不能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这些渠道平台建成了也是摆设。如今，“移动优先”成为推进深度融合的导向，实质上还是指把有价值的内容优先放到新媒体发布。缺少价值的内容再优先推送，也不会实现有效传播，融合传播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业内人士通过调查发现，“两微一端”的海量信息，让用户越来越“审美疲劳”，大部分订阅号的阅读量和受众黏度并不高，用户流失一直让人揪心。同样，“中央厨房”并不能有效吸引用户，为用户提供不可替代的服务，增加用户黏性。

当前，我们看到了许多“现象级”的新媒体创新产品。它们能够形成“刷屏”效应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是“中央厨房”或“两微一端”生产的，而在于其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今年以来，周口报业融媒体发布的微信中，阅读量超高的作品，全是取材于发生在我市的重大新闻。如《周口市委书记就着热泪推荐这篇文章，全场感动》《市委书记表态，这些任性干部要被处理》等，阅读量达到10万以上。反过来，有些新媒体产品制作很精美，标题很诱人，阅读量仍然不理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君超认为，“中央厨房”不仅是一个空间平台、业务平台、技术平台、资本运作平台，更应该是一个内容创新平台。过于看重技术在传媒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而忽视内容质量的提升，容易陷入炫耀镜头而忘记了种地的窘境。

就全国范围来看，媒体融合的步伐不一，无论起步早晚，融合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几乎一致。体制机制的适应，平台的对接，能力的培养……关键就是——内容，谁为新媒体提供内容，新媒体怎样发布内容。作为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刚刚起步的地市党报，也同样面临诸多难题。

一、供给与需求的不协调。新媒体的内容源于哪里？各地现行做法，几乎全是传统媒体记者身兼多职，既为传统媒体提供内容，也为新媒体提供信息。但是，传统媒体多年来内容供给模式不能适应新媒体的需求模式。党报多年来新闻来源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令性的采访，如时政新闻，一部分是记者自我选题。这两种稿件完成后汇集到编辑部，一般在晚上截稿，供稿的时间界限不影响第二天报纸出版。传统媒体的编辑流程与新媒体的编辑流程各自独立，传统媒体的内容传送审核渠道与新媒体不兼容。新媒体人员不知道当天有哪些新闻，也不知道要当天的新媒体制作哪些准备，常常出现被动等稿局面。

二、编辑与记者无法“同步”。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在采访记者与新媒体平台间建立一个微信群。所有发到新媒体的稿件，由记者传送到微信群，新媒体编辑时刻关注最新稿件，选中合适的及时在网站、“两微一端”编发。这种办法基本上解决了新媒体第一时间看到稿件的需求，部分解决了新媒体的即时稿件问题，但新媒体编辑与记者同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除了突发新闻的时间无法预料外，其他新闻采访之前，记者心中都会有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从记者接到新闻线索那一刻起，就可以与新媒体编辑“同步”，记者前方采访，新媒体编辑后台准备相关的链接、图片、表格等，这样会大大提高新媒体的时效。周口报业传媒集团记者与新媒体编辑之间，有过几次这样成功的“同步”配合，但是，还没有形成惯例，仅有的几次也只是记者与编辑个人之间的配合。没有统一的指挥平台不行，没有机制就不会长久，全方位多层次的“同步”就不大可能。

三、一次交稿与多次发稿。传统媒体记者多年来的惯例，稿件采写好后最终交稿。新媒体的内容是适时的，随时发布动态消息。这就需要记者在新闻发生中或采访中，随时发布快讯。传统媒体的供给与新媒体的需求在时间上又出现了偏差。媒体融合先行一步的地方，采取的是三次供稿法，即记者在新闻刚发生时，向后台发出一份100多字的快讯，等到新闻发生到一定的阶段再发出一份新闻，新闻事件完全结束后，记者再写出一份详细的完整的报道。如此不间断的报道，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新媒体即时发布新闻的需求，而相当一部分的媒体在融合过程中，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这种做法对现场记者是个考验，其惯常的采访写作流程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否则就不能适应新媒体的需要。

四、对新媒体需求把握不足。不同于传统媒体用户，新媒体用户具有平等、参与、简约等意识。新媒体稿件明显不同于传统媒体，包括内容选择、标题制作等都有自身的要求。记者在采访时虽为新媒体供稿，其实所写稿件明显不合适。领导讲话、会议材料、工作总结，全部抛给新媒体编辑。有的认为反正新媒体容量大，把大量甚至连传媒党报都不可能利用的“垃圾”稿件，统统发给新媒体，充作考核任务。周口报业传媒集团部分记者把基层领导活动、单位的材料统统发到新媒体平台，发稿数量虽然上升了，却谈不上质量，新媒体用户根本不可能浏览。

五、两套考核体系混淆。促进融合发展，机制体制一定要配套。没有科学完善的考核制度，向新媒体供稿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新媒体稿件的优劣自有相应的标准，一般以阅读量、点赞量、留言量等为主要指标。而传统媒体现行的考核是以篇数、字数为标准。现在向新媒体发布稿件的考核套用传统媒体的办法，也以篇数多少为考核标准，不论文章的质量高低。这明显是把两套不同的考核体系混淆在一起，调动不了大家的积极性，新媒体也得不到更多的好稿件，结果可想而知。

六、发稿缺少审核环节。经过多年的锤炼，传统媒体特别是党报已经建立起一套科学严谨的采编审核流程和体系，确保了党媒体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出现任何政治性偏差和问题。相对而言，新媒体稿件以快速、简洁、吸引眼球等为目标，其编发流程简单。无论如何简化流程，新媒体的真实性和导向性不能出问题。以人民网微信为例，经过近五年的发展，人民网现在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新媒体“采、编、发”流程，从内容来源到选题报送，从编辑加工到审核校对，都在严格地规范。目前，多数地方新媒体做不到稿件“三审制”，而是编辑把稿件稍加处理，由值班主任把关后，立即向外发布。这样的流程漏洞较多，容易出现问题。

七、从业人员亟需提升能力。人才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培养，传统媒体有一大批政治素养高、工作能力强的采编队伍，是办好党报的最基本保证。而新媒体从业人员多是刚从校园走出的年轻人，相当一部分还是聘用人员。他们一方面熟悉新媒体的特点，有工作激情，一方面缺乏政治素养，没有经过新闻从业人员的正规培训，“三观”模糊。如果不补足这个短板，很容易造成漏洞。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事关党媒体和新媒体的政治生命，刻不容缓。

解决内容生产与供给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要实现从传统媒体记者到全媒体记者的身份转变，进行党报媒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建设科学合理高效的内容生产供给体系。

外地一些先进媒体在打造新的内容生产线方面，有一些成功的尝试，就是传播内容的生产必须从以纸质内容生产为主转向以网并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重，乃至大量地生产互联网新闻产品，采取队伍的组织结构、思维方式与活动方式都要做到调整改变，特别是要敢于从各自独立分散的媒体中解放出来，进行采编结构重组和流程再造，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激励机制的变革，把分散在各媒体的采编力量重新组织聚合，分工协作，形成新的内容生产线。

媒体融合大势所趋，深度融合迫在眉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与挑战。内容的生产与供给，只是其中关键的一环。表面上看是内容在多个平台的多次传播，其实涉及到人员素质、组织架构、激励机制等深层次的因素，最根本的还是培养互联网思维。②12

(作者单位：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学术探讨



各位读者，本版的《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术探讨》《思想观澜》《热点冷析》《理论前沿》《观书有感》《调查研究》等栏目长期征稿，欢迎踊跃来稿，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请寄：zkrbwj@126.com zkrb1234@126.com
电话：15890589880 13525731576